

近代以来,经典教育在中国可谓命运多舛,在历经一个世纪反复强制摧残打压之后,今天的经典教育似乎迎来了它的春天。但问题依然不少,目前关于读经方法的争论便是证明,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有人提倡的“老实大量纯读经法”。

这种读经方法提倡全日制“纯读经”,3-13岁的孩子十年之中只是死记硬背各种传统经典,总共背诵上百万字,每天背书八小时以上,不学其他课程,不允许进行任何经义讲解,不允许读经典白文之外的书籍,包括古人注疏。这种方法看上去倒是简单易行,但是,稍微读过一点儒家经典者,立即会生出某种疑虑,隐约感到它与真正的儒家教育存在不小的差距,这差距究竟有多大呢?

毫无疑问,历史上教学生读经成就最大的,莫过于孔夫子,他弟子三千,贤人七十二,七十二子不仅在弘扬师学方面成效卓著,在事功方面也表现不凡。孔子是如何教学生读经的?在《论语》中,孔子是因材施教的,循循善诱的,启发式的,是一位善于开启学生内在心性之门,善于鼓舞学生内在精神生命的大师。

正是在这种如沐春风的氛围中,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后代十分不同的学堂:孔子课堂上,不仅有像宰我那样公然与老师唱反调而反对三年丧的;有像子贡那样给老师出难题,要求老师用一个字就概括出自己全部学问的精神的;还有像子路那样,当面就说“老师您也太迂了吧!”的。孔子本人也时常给弟子和他人道歉,所谓“丘也幸,苟有过,人必知之”。此情此景,你或许以为它是当代的欧美学校的场景吧?

孔门教育不同于现行知识教育,它是一种人格养成教育,以培养君子为目标的修身教育。修身的主要方法是切己体察、三省吾身和知行合一。这是一门很独特的学问,是一门用以自我反

日前,阿联酋也对中国实行免签政策,中国护照的含金量越来越高。而在古代,中国人出国需不需要类似护照这样的证件呢?来中国游历的外国人又是如何获得签证的呢?

光绪版新加坡护照

在福建漳浦县档案馆收藏有一张清朝新加坡总领事于1897年出具的护照(如图),长80多厘米,宽50多厘米。护照的主人叫王加禄,生于1860年,原籍福建省漳浦县前亭镇中山村。20岁到印尼经营烟草生意、开办银行。

这份清朝护照有两个页面,正页右侧粗字标明“代理新加坡兼辖海门等处总领事府张”,即护照由其出具,内容注明:“所有出洋华民自应任其回国安业,该总领事遵照办理查明是否良善,发给护照,以凭保护等,因历经遵办在案,兹查得王加禄系良善合行,发给护照,以免族党姻戚邻里胥役欺凌,以凭沿途关津地方官吏保护须至护照者。”左侧注明持照人身份,姓名:王加禄,事业商,籍贯: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,年岁38,寓居地:安班澜(现位于印尼龙目岛),发证时间:光绪二十三年(1897年)。

在清朝中叶之前,中国并没有“护照”的概念。鸦片战争后,清朝政府开始授权驻在中国境外的领事馆或海关,发放形式不一的护照。而新加坡是

【灯下碎语】

『老实大量纯读经』问题何在

省和自我提升的学问,专门把自己当对手的学问,一门目前大陆学校所没有又最急需的学问,牟宗三又称之为生命的学问。孔门教学的核心,在于人在生命的成长,始终将人作为目的,把人培养成具有内在精神力量的高尚的君子。

所以,学习儒家经典的方法,主要是体悟、领会与涵养,特别是交流讨论,《学记》早就告诫:“记问之学,不足以为人师。”所以,在丰富的先秦儒家教育文献中,我们看到的多半是如何开启学生心性和智慧的方法,却极少强调死记硬背的资料。就其本性而言,儒家比任何其他教育都反对死记硬背,因为这堵塞了心性成长之路,与儒学的本质相违背。

那么,人们为什么常常把儒家经典与死记硬背联系起来呢?这与汉代以后儒学的经学化,尤其是与一千多年的科

举历史有相关。河流的源头总是清澈活泼的,蕴含着勃勃生机;但是,随着流域的展开,它会变得越来越浑浊,有些段落甚至腐朽变质,儒家教育同样如此。比如科举下的学堂,已经丧失了活泼之上的灵动与活泼,它僵化了它把圣人之言作为绝对真理,不许经生提问质疑,典型体现了传统的经学思维。梁漱溟先生曾经指出,科举的教学模式是不符合孔子教育理念的。

其实,科举制度除了记诵之外,也要求学生解经,以应对科举中的释经和策论。红楼梦第八十二回《老学究讲义警顽心,病潇湘痴魂惊恶梦》,私塾先生贾代儒要求宝玉讲书,所讲是《论语·子罕》的“后生可畏”章。宝玉奉命先讲“节旨”,又串讲字句道:“这章书是圣人勉励后生,教他及时努力,不要弄到老大无成。先将‘可畏’二字激发后生的志气,后把‘不足畏’三字警惕后生的将来。”宝玉的理解是到位的,代儒却嫌他的解说具有孩子气,于是作了更进一步的阐发。可见,历史上的私塾是十分重视解经的。

老实大量纯读经的支持者如是说:“做读经老师不需要有文化,不用讲解,也不许讲解,只要会按复机按钮、督促小朋友背诵,就是最好的读经老师。”这里公然将复机称之为最好的老师,在禁锢压抑学生的思想活力方面,甚至使得科举制度下的私塾都相形见绌了。

可是,人不是留声机,儿童也不是。如果说儿童的理解力较弱,他的情感感受能力和想象力却毫不逊色,甚至超出成年人一筹,他们是天生的诗人,天地万物都是他们交流的伙伴。所以,儒家总是顺着他们的天性加以引导,使得童蒙教育充满情趣和丰富多彩。

这方面,王阳明的儿童教育堪称典范。他说:“大抵童子之情,乐嬉游而惮拘检,如草木之始萌芽,舒畅之则条达,摧挠之则

之则衰萎。”他认为,儿童的天性是喜欢游嬉而害怕禁锢,如同刚萌芽的小草,顺遂它天然的生命就会快速成长,人为压抑它就会萎缩凋残,所以,他主张采取“诱”“导”“讽”的“栽培涵养之方”,来取代“督”“责”“罚”的教育方法了,并警告说,相反的做法只会使得学生“视学舍如囹狱”“视师长如寇仇”。王阳明明确反对那种不分学生天资情况的“大量纯读经”,主张读经的量应留有余地,“凡授书,不在徒多,但贵精熟:量其资禀,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,常使精神力量有余,则无厌苦之患,而有自得之美”,这才是孔门读经法的真传!不怕不识货,就怕货比货!两相对照,就可以丈量出“老实大量纯读经法”与真正的儒门教育的距离了,这距离不算太长,也不算太短,正好处于对立的两极!

所以,所谓老实大量纯读经,不是儒家的读经法,而是反儒家的读经法。它最终不能培养出圣贤人格,倒是培养了一些再也不愿意听到经典二字的国学逆反者,一些心态阴沉闭锁的问题少年,以及一些最终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惶惶不可终日的家长们,是不用大惊小怪的。逼迫一个天真好奇的孩子,用十多年去背诵那些他既不懂又不许问的佶屈聱牙的古文,他的心理不出问题才怪呢!这一读经法考虑了一切,唯独忽视了一点:人本身!使得它不仅违背了教育的规律,更违背了儒家教育的根本精神。

若要问何以在当代出现了这样一种令人纳罕的儒家读经法?这也正是我的困惑所在。不过,它给我们的重要的启迪,是令我们反省我们离开真正的儒家究竟有多远,并对目前各种流行的所谓“儒家”保持一份清醒和警惕!

(作者赵法生为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,原载于《中华读书报》)

【书中风云】

卡斯特罗曾为马尔克斯当“编辑”

在媒体的刻画中,前古巴领导人菲德尔·卡斯特罗是革命英雄,不过你可能想不到的是,他在世界文坛上也享有一席之地。卡斯特罗生前曾在私下里担任过马尔克斯的文字编辑,为后者校对书稿。

阿斯顿大学拉美文学研究系的讲师史蒂芬妮于2009年出版的《菲德尔与加博》(加博是拉美人对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爱称)一书中,她讲述了两人的关系,并说马尔克斯会先将自己完整的手稿寄给在哈瓦那的卡斯特罗,再递交给出版商审阅。

史蒂芬妮博士告诉《卫报》称:“菲德尔·卡斯特罗总统生前是一位书迷。当他和马尔克斯在1977年会面的时候,两人聊了几次文学。最后,卡斯特罗主动提出愿意校对马尔克斯的手稿,因为他很细心。”

卡斯特罗的校对也仅限于事实和语法方面,而不涉及思想层面的问题。史蒂芬妮说,“在拜读了马尔克斯的《一个遇难者的故事》之后,卡斯特罗告诉马尔克斯他在写到船速的时候出现

了一处计算错误。正是这件事让马尔克斯决定邀请卡斯特罗来校读自己的手稿。还有一次,卡斯特罗在《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》中指出了一处关于猎枪规格的错误。”另外,卡斯特罗还对小说中人物使用的枪支和子弹的匹配情况提出过建议。

1977年,卡斯特罗和马尔克斯在一个古巴旅馆相遇。尽管那次会面据说是巧合,史蒂芬妮仍认为卡斯特罗可能有意促成了两人的会晤。在此之前,卡斯特罗听说马尔克斯在写作一部关于古巴的非虚构作品,借古巴百姓之口来讲述受美国的通商限制的古巴生活。不过这本书从未问世。

在德州大学的兰塞姆中心从马尔克斯的私人图书馆处获取的书中,人们发现了一个证明马尔克斯和卡斯特罗亲密关系的证据。在《战略的胜利》一书的扉页,卡斯特罗给马尔克斯写了几句话,并亲昵地称他为“加博”。这些话写于2010年,当时他正忙于处理海地地震带来的灾难。“你的作品《我不是来演讲的》让我心绪难宁”,卡斯特罗这样告诉自己的好友,“尽管我公务缠身,但我仍然抛下了我的工作读起了你的书。我很想念你的故事。”他继续写道,海地的瘟疫“让我想到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”。

兰塞姆中心获取的各类图书表明,马尔克斯可能不止激励了一位政坛领袖。一本西班牙语的比尔·克林顿回忆录《我的生活》上有这样的题词:“献给我的朋友加西亚·马尔克斯,感谢你的生命,你给我的激励和你的善意。”人们都知道,马尔克斯曾与克林顿谈论过古巴问题。史蒂芬妮说,在马尔克斯的干预下,几位政治犯在那次谈话之后获释。

尽管马尔克斯听取了卡斯特罗的校对意见,但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也曾试着向卡斯特罗提供建议。在一个1978年的采访中,马尔克斯说,他会在私下里当面批评卡斯特罗,但绝不会公开批判他。

一位叫做安娜·埃尔韦的出版编辑经理称,马尔克斯和卡斯特罗的合作实属罕见。因为“一方面,大多数伟大的当代艺术家都把自己放在精英阶层的对立面;另一方面,政治家的品位一般都很糟糕。”

(文/李静云 摘自澎湃新闻)

【阅案所得】

清朝的护照什么样

中国在海外设置领事的第一个地方。

1905年粤商赴美护照

1905年8月18日,清朝两广总督岑春煊曾签发过一份护照,护照的主人名字是江驥。他在广东花县平山村经营一家名叫“太和”的商店,拥有股本三万元,还有价值两万两白银的家产。这位地方富商向广州政府申请去美国游历,开开眼界。

1905年是美国百年排华运动的高潮年,美国政府明令禁止“华工”入境。就在江驥申请游美护照的前一个月,中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,其目的就是抗议美国压迫华侨。这让江



骥此行蒙上一层阴影。不过,美国是允许中国商人入境游历的,像江驥这样的广州富商更是欢迎。所以,两广总督岑春煊会同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雷伏礼,于1905年8月18日分别在江驥的中国护照上签了名,准许其赴美游历。

这份护照共有中英文两页,中文页主要介绍了江驥的家世背景、社会职业、财产状况以及他本人的相貌描述,其中特别强调,护照持有人江驥的“右眼角有一颗黑痣”,时年19岁。对于江驥的上述信息,美国广州总领事雷伏礼进行了认真核对,然后在江驥的照片上加盖美国总领事的“骑缝印”。护照还有一份英文页,是对中文版的翻译说明。

1910年给德国人的护照

“德国民人,欲往内地各处游历,须由领事官暨地方官发给盖印执照。随时饬交,随时呈验。”在浙江瑞安博物馆收藏有一张宣统二年(公元1910年)的护照,约有翻开报纸那样大。

据温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介绍,这张护照是大清宣统二年(1910年),清朝政府依据《天津条约》的规定,为德国人艾仕德颁发的可游历湖北、湖南、广西、贵州等地的通关护照。

根据当地的规定:在华工作生活的洋人,出口岸百里以外,必须申请护照。而外国人在华游历,护照上必须写明起止地点,“除仍前注明省份外,另将欲往何处府县地方详细开列”,旅游地域一般不准超过四个省。

由于战争及语言文化背景不同等原因,当时清政府人为设立种种限制与繁琐手续,外国旅游者经过地方州县都要向地方官报告,同时沿途查检护照,所到之处还有地方官差随同,名为保护,实为监视。那时外国人想去西藏,更是做梦。因为,西藏一直没有对外国旅游者开放。

不过即使如此麻烦与不便,还是挡不住大批的外国人涌进中国探险游历。清末江苏镇江关的一份档案显示:1900年一年中,该关签发过的外国人游历护照就达208张。

(宗禾)